

理想化的完美山水

——台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1895-1945）*

李嘉瑜

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副教授

摘要

基隆八景在台灣的「區域性八景」中，無疑是相當特殊的，因為一直要到同治時期（1862-1874）才有基隆八景的標目出現，而且整個清代，只有宜蘭詩人李逢時（1829-1876）的〈雞籠八景〉留存。目前可見的基隆八景詩絕大多數都是寫於1904年。為什麼清代就已選定的八景，卻要到下一個世紀，台灣已成為殖民者的土地之後，才能得到文人的注目與迴響呢？這是值得探索的論題。本文將以日治時期（1895-1945）台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為討論主題，將八景視為一種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追索無意義的空間究竟被賦予了何種價值，才能成為有意義的地方（Place）？為什麼基隆八景詩會在日治時期大量出現？而作為文學文本，基隆八景詩又對八景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的形塑，產生了何種影響？這些論題的解讀，將能幫助我們對基隆八景與基隆八景詩有進一步的了解。

關鍵詞：基隆書寫、基隆八景、台灣古典詩、文化地景、文化地理學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2013年第八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講評人黃美娥教授與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讓本文的論述能得到深化與補正的機會，謹此致謝。

The Idealized Perfect Landscapes:

“Eight Views of Keelung” in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1895-1945)

Lee Chia-Y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oem headings with “Eight views of Keelung”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Tongzhi period (1862-1874). It makes the “Eight views of Keelung” in Taiwan’s “Regional eight scenery” so special. Moreover, in the entire Qing Dynasty, only Lee Feng-Shi (1829-1876), a Yilan poet, mentioned Keelung’s views in his “Cage eight scenery.” The classical poems of eight views of Keelung we read now were mostly written in 1904. Why didn’t the “eight views” which had been selected in Qing Dynasty bring to intellectuals’ attention and arouse echo until the next century while Taiwan was a colonial land the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ight Views of Keelung” in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Taking the “Eight views” as a cultural landscape,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value has given to such a meaningless “space” to become a meaningful “place”? Why did the “Eight Views of Keelung” poems appear in a great number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As literary texts, what influence of the “Eight Views of Keelung” poems has excised over forming the sense of place for the eight view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topics, it hopes that w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ight Views of Keelung” and their related poems.

Keywords: Keelung Writing, Eight Views of Keelung,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Geography

理想化的完美山水

——台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1895-1945）

一、前言

八景書寫的相關研究，¹在現今台灣文學的領域中，已有相當深刻的掘發。²相較於台灣其他地域的「區域性八景」，基隆八景的特殊性無疑展現在它出現與盛行的時間區段，因為一直要到同治時期（1862-1874）才有基隆八景的標目，而且整個清代，只有宜蘭詩人李逢時（1829-1876）的〈雞籠八

-
- 1 本文對於「八景」的定義，是除了被選擇的八個景點之外，還必須有四字一組的八景標題，才能稱之「八景」，石守謙將這種「標題式的命名」與「文學書寫」合稱為文學性的「品題」，認為只有通過這種「品題」，自然風景才能轉化為具有文化意義的勝景。以基隆八景為例，「社寮曉日」是八景中的一組，其由地點「社寮」與物象「曉日」組合，這與單純選取「社寮島」者不同，因為前者是在社寮島的風景中獨選曉日為勝，後者卻泛指整個社寮島的風景。由此，本文所設定的八景範圍，並不是要討論「雞山」、「杙峰」、「鸞嶼」、「魴頂」、「仙洞」、「社寮島」、「八尺門」、「獅球嶺」等八個基隆的著名景點，而是「雞山聚雨」、「杙峰聳翠」、「鸞嶼凝煙」、「魴頂瀑布」、「仙洞聽濤」、「社寮曉日」、「八尺澄清」、「獅嶺匿雲」這八個經過文學性品題的勝景。對於八景詩，亦採相同的認定。石守謙的說法請參看氏著，《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2.02），頁24-25。
- 2 八景書寫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在台灣八景方面，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05），以其1999年的碩士論文為基礎，是最早將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納入研究視域，並進行系統整理者；陳佳妤，〈清代台灣記遊文學中的海洋〉（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0），第四章〈台灣八景中的海洋景觀〉是透過海洋景觀，解析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如何被運用於八景中的海洋空間；許玉清，〈清代台灣古典詩之地理書寫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5），第三章〈景觀／觀景：台灣府八景詩之地理書寫〉將八景解讀為一種想像挪移，使物質性存在的八景投射為詩人的想像八景；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台灣八景詩」首創之作的空間探討〉，《國文學報》5期（2006.12），頁35-55，則從空間與視覺的角度，展示台灣八景詩首創之作中的台灣意象；申惠豐，〈帝國的審美與觀視：論台灣八景言說的建構及其美學意識形態〉，《台灣文學研究》1卷2期（2012.06），頁79-132，其以「領土」與「鄉土」區別宦遊詩人與本土詩人對台灣的認同，由此將台灣八景的選定，視為一種「宣示斯土的政治戰略存在」，而這也表現於台灣八景詩中的視野、修辭與意識形態中。在區域性八景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觀光文化》（台北：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07），頁69-106，原刊於《台灣人類學刊》1卷2期（2003.12），本文透過宜蘭八景的個案，認為八景的選定與命名是一種對地方的教化與馴化，這種觀看視野，之後經常為研究者所沿用。其他有關台灣區域性八景的研究，還有王幼華，〈苗栗八景詩論〉，《苗栗文獻》5期（2002.03），頁80-88；陳喻郁，〈景觀之外的解讀——清代彰化八景的另類思考〉，《彰化文獻》9期（2007.10），頁93-124；許雅菁，〈日治時期鹿港竹枝詞與八景詩的在地書寫——以大冶吟社作品為討論核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碩士論文，2008）；許雅菁，〈鹿港八景詩中的鹿港書寫〉，《彰化文獻》13期（2009.12），頁230-259；陳喻郁，〈八景演變的相關探討——以彰化八景為例〉（花蓮：花蓮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碩士論文，2009）；申惠豐，〈地方與地方意象：以清領時期彰化八景詩為例〉，《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4號（2010.12），頁31-55等。

景〉留存。目前可見的基隆八景詩絕大多數都是寫於1904年，也就是日治初期。為什麼清代就已選定的八景，卻要到下一個世紀，台灣已成為殖民者的土地之後，才能得到文人的注目與迴響呢？這是值得探索的論題。

目前學界對於基隆八景的研究並不多，沈心菱〈文學中的基隆歷史意象（1684-1945）〉雖希冀透過文學文本解讀清領與日治二個時期的基隆意象，然而其於八景書寫卻僅僅提及「基隆在日治時期延續清代八景的體制，而產生『基隆八景』詩作」，³至於何謂基隆八景及其相關詩作，完全未曾說明。陳青松〈漫談基隆地區傳統文學發展史（上）〉雖標出基隆八景，不過只針對許梓桑（1874-1945）⁴的八景之作，進行評述，如「許梓桑創作的『雞籠八景』詩篇，是日治時期描述基隆名勝古蹟的文學代表作。全詩行雲流水，簡潔扼要，將古基隆的特殊景觀詮釋得淋漓盡致」。⁵真正在學術意義上涉及基隆八景的討論者，主要有三，分別是許惠玟的〈道咸同時期（1821-1874）台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柯喬文的〈基隆漢詩的在地言說：《詩報》及其相關書寫〉與賴恆毅的〈在台日人之基隆書寫——以《基隆港》收錄之日人漢詩為觀察場域〉。許惠玟主要聚焦在基隆八景的命名與八景標目的說明，其說對於清代兩組八景的解讀頗見用心，⁶只是以李逢時〈雞籠八景〉出現的時間早於《淡水廳志》的八景，就將其視為八景的命名者，由此推論「他似乎是有意要

3 沈心菱，〈文學中的基隆歷史意象（1684-1945）〉（台北：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85-86。此文只述及清領時期台灣八景中的「雞籠積雪」，而未有關於基隆八景的討論，其所列舉藉以呈顯「在地人眼中的基隆」之詩作，亦無基隆八景詩，如列出李逢時〈夜入雞籠用前韻〉，卻未列其〈雞籠八景〉。此外，許梓桑著名的〈基隆八景〉亦未列入。

4 簡萬火，〈許梓桑小傳〉，《基隆誌·附錄》（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08），頁1，「許梓桑君，基隆一代表者也。少聰穎、好讀書，耽吟詠，藹藹然有君子之風焉。凡事秉正，公舉為區長及街名譽助役，現任州協議會員，同風會長及各種委員總代理顧問等。」

5 陳青松，〈漫談基隆地區傳統文學發展史（上）〉，《台北文獻》160期（2007.06），頁92-93。又其認為「依據文獻記載，本市名詩人，也是地方士紳許梓桑，在大正6年（1917）已完歌詠『雞籠八景』詩句（事隔六十年後，於民國63年才由大同吟社社長陳其寅，賦詩詠誦『基隆新八景』詩句）」，事實上，寫作基隆八景的作者不僅其所提及之二人，舊基隆八景的書寫者僅1904年以組詩形式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就有11位12組（許梓桑以乃蘭為名，發表五絕與七絕共二組），節錄者有二位，參見本文註56。

6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台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頁161-163，有標題為「李逢時的『雞籠八景』詩」的討論，其說比較淡水廳志與李逢時的八景，認為「景點相同但名稱略異的有『鰲嶼凝煙』、『海門澄清』、『奎山聚雨』、『仙洞聽潮』四景」、「景點相同但景觀相異的為『社寮曉日』及『社寮漁火』」、「所選景觀完全不同者，可以

爭奪這些『既定』的命名權與選景權，讓八景更具有『代表性』，正因為他是本土文人，所以才更貼近本土與在地，李逢時在八景詩的書寫上，真是值得好好記上一筆」，⁷令人困惑的是現存最早的八景詩作者是否就能等同於命名者？如果這兩組八景的命名屬於異時的競爭關係，何以會有如此高的重覆性？⁸或許如同西湖十景的命名，二者極可能都參考了「好事者」的說法。⁹至於柯喬文之作，雖然意圖呈現基隆八景在日治時期的殊異性，但其將李逢時的時代誤植，而與許梓桑同時展列於日治時期進行比較，認為二者八景詩的特色「是採納神話想像，以及排除帝國事物，包含港町建設、軍事要塞等」，¹⁰李逢時是清代的詩人，許梓桑則沿用《淡水廳志》的八景標目，二者的八景自然不可能納入任何殖民母國的事物。賴恆毅則比較了許梓桑與日人澁谷春濤（生卒年不詳）〈題自書雞籠八勝圖〉中的八景，認為「在日人為主體的當日社會，基隆的地方意象趨向現實的、可視的層面」¹¹，但何以如此呢？從「獅嶺匝雲」到「獅球嶺」，這樣的景觀變化真的是「從大範圍的景致，縮限為單一

確定的為『毬嶺市雲』及『燭嶼夜光』，至於不能確定是否為同一景點的有「杙峰聳翠」、「三爪聳翠」與「峰頂觀瀑」、「人堆戰浪」。不過其將「人堆戰浪」推判為瀑布，如「李逢時的『人堆戰浪』應該是象瀑布之形，而『盡日濤聲作戰聲』應該就是寫瀑布之聲了」（頁162），這種說法是有疑慮的，因為《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6.28，1版，言瀛社庚戌第三期例會，曾以「人堆戰浪」為課題，並指稱「人堆戰浪」是「在基隆港口，其左畔船舶出入處。山上有燈台，台下有石嶙峋，排列為一直線，儼然人形立於波中，斜出港側，浪去浪來，衝激於石，勢若戰爭，俗云萬人堆」；《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10.26，4版，亦稱「人堆戰浪（仙洞萬人墩石人戰浪）」，可知所謂的「人堆戰浪」指的應該是基隆仙洞北邊的礁石群，遠望如萬人堆者，1900年設有基隆燈塔，豬口鳳庵，〈基隆燈台〉，「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6.03.02，1版，即稱「夕陽紅映萬人堆，健鶻盤旋去又回。忽地北風催雨急，濤聲鞞鞞撼燈臺。」此外，林子楨，〈人堆戰浪〉，「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10.07.29，1版，「人堆鼎立鎮基隆，形勝渾疑八陣同。長與波臣事爭戰，劇憐頑石亦英雄。」這些都可印證「人堆戰浪」與「峰頂觀瀑」是不同的景點。

7 同前註，頁162。

8 李逢時與《淡水廳志》的八景中，有六個景點是重覆的，如鯤嶼、社寮島、八尺門、基隆嶼、雞山、仙洞。

9 祝穆，《新編方輿勝覽》，卷1（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3.06），頁7，「好事者嘗命十題，有曰：平湖秋月、蘇隄春曉、斷橋殘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鐘、曲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

10 柯喬文，〈基隆漢詩的在地言說：《詩報》及其相關書寫〉，《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12期（2008.12），頁184。此文在資料徵引方面，出現許多訛誤，除了將李逢時的時代誤植為日治外，還將《淡水廳志》的編者陳培桂誤植為楊淩（頁180），許梓桑之作亦誤繫於1917年（頁182）。事實上，許梓桑的〈基隆八景〉雖收於1917年出版的《基隆港》中，但許氏早在1904年即署名乃蘭，將之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參見乃蘭，〈基津八景〉組詩，「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2，1版。

11 賴恆毅，〈在台日人之基隆書寫——以《基隆港》收錄之日人漢詩為觀察場域〉，《文史台灣學報》5期（2012.12），頁160。在賴恆毅的論文中，認為清代的雞籠八景是有景無詩（頁159），《淡水廳

對象」¹²嗎？或可再深思。就上述的研究成果而言，可以發現目前的相關研究所涉及的基隆八景詩僅李逢時、許梓桑、澁谷春濤三者。討論文本的不足，將使研究者的視野受到一定的侷限，相對來說，這也是本文希冀能深化與補足的面向。

本文將以日治時期（1895-1945）台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為討論主題，在論述方面，主要以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作為參考架構，因為所謂的八景原本就是一種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我們要追索的是無意義的空間究竟被賦予了何種價值，才能成為有意義的地方（Place）？¹³八景詩的書寫者是透過何種文化鏡片凝視這些地方？而他們的書寫又分別對八景與基隆之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¹⁴的形塑，產生了何種影響？以下我們就沿著這些思索，展開討論。

二、變換的背景：殖民母國嶄新的南方玄關

同治時期的兩組「雞籠八景」中所指的「雞籠」，在地理概念上表述的應該是圍繞雞籠港灣的地區。¹⁵從「雞籠」到「基隆」，¹⁶「基隆」的概念，歷

志》的雞籠八景確實有景無詩，但李逢時的〈雞籠八景〉也在清代，不但有景亦有詩，略而不論，並不適宜。此外，其據澁谷春濤的自註「此地為石碇雞籠二堡之界」，認為雙龍瀑應在「七堵的瑪陵坑附近」（頁159），所以不同於魴頂瀑布。但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編，《台灣鐵道案内》（台北：台灣總督府鐵道部，1912），頁12-13，「八堵驛」的介紹中，車站的位置是在「台北廳石碇堡八堵庄內，戶數八十，人口四百十四的小村落」，其附近景點有「雙龍瀑」，「從基隆乘蒸氣火車，往南前進不到二哩的地方，會遇到一長達1835尺的大隧道，在隧道北方入口有一小瀑布，巖頭水分為二條，如同蛟龍爭珠，這是雙龍瀑之名的由來」，可知雙龍瀑所在位置與八堵隧道附近的魴頂瀑布是相同的，而魴頂瀑布的特色亦是水分二流，江蘊和，〈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魴頂瀑布〉，「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6.14，1版，詩中有作者自註，「魴頂瀑布其間有雙瀑」；蔡一靜，〈基隆八景·魴頂瀑布〉，「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01，1版，「瀑布雙懸石壁間，天然巧織未曾刪」，由此可判定雙龍瀑其實就是魴頂瀑布。又表二的列表於八景的標題出現許多錯誤，如將許梓桑的「鸞嶼凝烟」錯標為「鸞魚凝烟」，澁谷春濤的「吐霓橋」錯標為「吐霓橋」。

12 同前註，頁159。

13 在文化地理學的理論中，「空間」與「地方」是兩個不同的概念，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03），頁19，就這樣定義「地方」——「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命名是一個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空間」在這種論述脈絡中，則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

14 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15，如此闡述「地方感」，「是指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小說和電影（至少那些成功的作品）時常喚起地方感——我們讀者／觀眾知道『置身那兒』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15 陳凱雯，〈從漁村到商港——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的形成〉，《兩岸發展史研究》創刊號（2006.08），頁258，「基隆原稱『雞籠』，在明代為漢人稱呼台灣或北台灣的統稱，隨著清代漢人大量入臺開墾，『雞籠』一詞也逐漸縮小指稱圍繞基隆港灣的地區。」

經多次重寫，¹⁷但日治時期「基隆八景」中的「基隆」，指涉的對象應該仍是港都基隆，因為八景全都環繞著基隆港灣，書寫者甚至直接以「基津八景」命題，¹⁸「津」指的就是港口。

1895年，揭示了日治時期的到來，而這同時也為港都基隆的發展，標志出一個新起點。¹⁹因為基隆能從漁村轉變為現代化的港口與城市，主要來自殖民母國的改造。²⁰日治之前，在1884年的清法戰爭中，作為兩軍交戰地的基隆，城市建設毀壞殆盡，茶商John Dodd（1838-1907）曾如此描述當時的景況：「該城已成為廢墟，只有被法軍用來當醫院、住處的屋舍尚殘留，但卻髒亂無比，充滿腐臭味」，²¹其後基隆的發展逐漸衰退，²²在日清政權交替時，還是「人口不過七千餘之小市街」。²³

-
- 16 中島新一郎，《基隆市案內》（基隆：基隆市役所，1930.12），頁48，「光緒元年（西曆1875年）島內行政機關更新的同時，將北路撫民理蕃同知改稱，也把舊日的地名雞籠，取基地昌隆之意，改名為基隆。」本文對於「雞籠」與「基隆」的使用，以1875年為界限，更名之前用「雞籠」，更名之後則用「基隆」。
- 17 如日治時期設基隆郡，所以當時所指的「基隆」，有基隆郡與基隆市二者，簡萬火，《基隆誌》，第三卷是「基隆市大觀」，第四卷是「基隆郡大勢」，就將二者分列。此外，張炎憲主編，陳存良譯，《基隆郡勢要覽（昭和9年版）·基隆淡水郡彙編》（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12），頁95，指出基隆郡「除七堵、雙溪、平溪三庄外，金山、萬里、瑞芳、貢寮四庄皆濱臨海洋，且基隆市位於其心臟地帶，成為港都背後的農村，供應新興基隆市八萬市民的食品消費，擁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港都的興隆指日可待，應可為十萬郡民帶來經濟上的繁榮」，可知基隆郡指的是七堵、雙溪、平溪、金山、萬里、瑞芳、貢寮七庄，共十萬人，基隆市指的是位於基隆郡中心的港都基隆，當時人口有八萬人。
- 18 例如乃蘭，〈基津八景〉組詩，「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2，1版；江蘊和，〈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組詩，「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6.14，1版。此外，李學樵，〈基津晚景〉，「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14.07.24，6版，「四面燈明燦水濱，漁歌遙唱晚涼新。今宵雲影波光灑，月色浮沉景最真」，由「水濱」、「漁歌」的意象使用，亦可知其所指的基津，正是港都基隆。
- 19 基隆在日治時期的快速發展，是公認的事實，並已為學者普遍認可，如黃師樵，〈光復以前基隆開發小史〉，《台灣文獻》24卷1期（1973.03），頁84，「滿清腐敗，台灣版圖易邑，歷五十年長久之間，被異族日本統治下的基隆港都，比未割讓前之滿清統治時代，確有長足的進步，飛躍的發展成就，這是眾所皆知，誰也不敢否認」；羅曉萍，〈基隆港碼頭聚落的建構與形塑〉（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5），頁29，「主權移轉對民族來說，是一次罹難的開始；然而對基隆港來說，卻是重生的曙光。」
- 20 陳凱雯，〈從漁村到商港——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的形成〉，頁258，「1895年6月3日日軍砲擊基隆，5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登陸基隆時，發出諭告，設立基隆支廳，開啟了對台灣本島的統治。1896年設置了『基隆築港調查會』，一直到1945年統治結束之前，築港與市區計畫一直持續進行，不僅將基隆從漁港改造為國際港口，並帶動了基隆移民人口的集中與都市化過程。」
- 21 John Dodd（陶德）原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台北：原民文化，2002.07），頁148。
- 22 羅曉萍，〈基隆港碼頭聚落的建構與形塑〉，頁24，「直至一八九一年尚無茶葉、樟腦至基隆。在此官方無意、商人裹足的態勢下，靠泊基隆港的船隻只是為了加煤而已。」
- 23 簡萬火，《基隆誌》，頁13。

基隆的地位，在被選定為帝國的南方玄關時，²⁴ 發生了改變。日人建設基隆港，除了實利的考量外，也在展示「帝國的威嚴」，²⁵ 所以日治時期「五十年間，有整整45年（1899-1944）以軍港、商港並設之法致力於港口的建設」，²⁶ 在築港與市區改正計畫的雙重改造之下，基隆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文明經驗的輸出地。²⁷ 以下我們將透過三個面向來解讀日治時期港都基隆的躍進與變化。

（一）繁華的港口

日治時期的基隆港是日本帝國的重要軍港，²⁸ 同時也兼具商貿與客運的功能。在商貿功能方面，「基隆港第一次築港工程完成時，1903年起，貿易額即超越了淡水港，一躍成為台灣最大的商港」，²⁹ 第二期工程完成時，出入的國際貿易船隻與噸數在全日本的港口中佔第六位，「與長崎港不相上下」，³⁰ 可以說在日治初期，基隆港就已轉變為現代化的國際商港。在客運功能方

24 「帝國的玄關」是基隆在日治時期重要的意象，台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編，《基隆を中心に》（台北：末廣高等小學校，1924.07），頁54，即稱基隆為帝國的玄關。

25 黃文德主編，《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台北：國家圖書館，2012.01），頁28，「當時外國不看好日本的做法，如英國認為築港計畫不會成功」，所以石黑五十二、石橋絢彥的〈基隆築港報告書〉才有這樣的說法，「今後一切必須據以理想之規模發展，對外免得我帝國受歐美之恥笑而損帝國之威嚴」。引文參見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港務局譯，《基隆築港誌》（基隆：基隆港務局，1975.06），頁8。此外，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台灣史蹟》39期（2001.12），頁26，亦指出「基隆港市作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的門戶港口；其重要性除了擔任台灣日本間的主要聯絡港之外，更是展現日本現代化築港技術的一個舞台，象徵殖民母國的統治實力，因此總督府對基隆築港所投入的人力、時間、經費都是全台港口中最高的。」

26 羅曉萍，〈基隆港碼頭聚落的建構與形塑〉，頁27。

27 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台灣史蹟》39期（2001.12），頁1-38，對此有詳細的解說。以築港為例，日本築港的技術主要傳承自荷蘭，明治13年以後才逐漸由日本人自己擔任築港設計與監督，這些在日本具有豐富築港經驗的技師如石黑五十二等人也都參與了基隆港的實地調查與規畫，之後在工程中負責實際施作的技師則多出自東京大學土木科，所以「基隆港可說是日本現代化築港技術移植傳承至殖民地台灣的代表港口」（頁28）。

28 日治時期的基隆港是日本海軍列管的軍港之一，其築港工程亦由軍方主導。1903年成立的基隆要塞司令部，對於基隆都市計畫的發展亦具主導權，《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3.02.19，4版，即報導「關於將來大基隆市形成之都市大計畫案，此次督府已得原案，現正在基隆要塞司令部」，而當時所發行的所有以基隆為主題的明信片，皆需得到基隆要塞司令部的許可，即可見一斑。作為日本帝國的重要軍港，也使基隆在二戰期間受到嚴重的破壞，如同黃文德主編，《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頁16，所指出的，當時「美軍轟炸機先後空襲基隆25次，10萬人口疏散到僅剩不到4萬，市區56%的房舍全毀，為全台受創最重。」

29 林佩欣，〈日治時期基隆街（市）人口職業結構與地方參與〉，《史耘》12期（2007.06），頁77。

30 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頁10。

面，台日間的航線是以基隆為主要的進出港，「並以門司、宇品、神戶、大阪、名古屋、橫濱、東京等港為航線的靠泊港」，³¹而各個命令與自由航線，以基隆為停泊港口，又可通往中國、南洋與歐美各地。



圖1 日治時期的基隆。資料來源：新原書店發行之明信片，原題為「基隆市街全景」。

Michel Foucault（米歇爾·傅柯，1926-1984）認為領

土、交通與速度是現代社會空間的三個構成要素，³²作為台灣最早進入現代化的國際港口，西式船艦所帶來的空間移動與速度感，讓基隆成為一個不斷運動著的巨大場所，如同桃園詩人邱筱園（1878-1942）³³所說的「此間柑產名天下，朝山雞籠暮馬關」，³⁴新竹剛上市的新柑，早上還在基隆，日暮已到馬關港，正表現了這種時空感受的變化。

不斷運動著的港口，同時也聚合著人群，1916年陳薰南（1892-？）〈九月十九日登獅球嶺〉曾這樣描述遠眺所見的基隆港：

獅球嶺上望基隆，海陸繁華人氣充。昔日漁村蹤跡杳，白帆天外飽歸風。³⁵

在這裡，清楚呈現主體經驗所感知的環境變化，過去的漁村，如今已是

31 林雅慧，〈「修」台灣「學」日本：日治時期台灣修學旅行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所碩士論文，2010），頁72。

32 Paul Rabinow著，陳志梧譯，〈空間、知識、權力——與米歇·傅寇對談〉，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12），頁416。

33 黃紅炎，〈邱筱園小傳〉，《瀛海詩集》（台北：台灣詩人名鑑刊行會，1940.11），頁148-149，「邱世濟號筱園，新竹之龍潭人也，善屬文能詩，為漢學界耆宿，性亢爽高潔，有耕隴抱膝高吟之概，然圭璋品望為世所重。於文化經濟產業之建設，輒推主焉多所樹立。春風門巷，不徒擁擠問字之車，其物望可知矣。」

34 邱筱園，〈新柑〉，李嘉瑜編著，《日治時期台灣漢詩人：邱筱園詩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11），頁127。

35 陳薰南，〈九月十九日登獅球嶺〉，「南瀛詞壇」，《臺灣日日新報》，1916.12.02，3版。

「海陸繁華人氣充」。事實上，這種有關繁華的修辭，幾乎與當時的基隆緊密相連，如《臺灣日日新報》在評述新井卓美（生卒年不詳）的基隆竹枝詞時，³⁶亦言「基隆比來之盛況如見。再渡十年，又將為繁華第一地矣」，³⁷換言之，漁村起家的港都基隆，在似錦繁華中，儼然有島嶼的明星城市之姿。

（二）現代的城市

日本殖民政府在積極築港的同時，也對基隆的城市空間進行改造，為了創造一個潔淨、理性與明亮的現代化城市，建設與毀壞並進，如鋪設混凝土道路、興建公設住宅、開放公園綠地與規畫自來水設施等，顯然，東京的歐化經驗，被有效地移植在殖民地的港都。1898年粘伯山（1854-1904）來到基隆，行走於城市中，就已感受到與過往不同的身體經驗——「向者因糞無用，廁池少而汙地多，街衢積穢難行。雨來溝泥易溢而販賣雜諸人復排架於街上，壅塞不堪。今則道途潔淨，市場設諸媽祖宮口」，³⁸這也預告了這個城市即將走向現代化的過程。

然而，在舊事物摧毀的同時，新景觀也在創造，許多充滿西洋風味的建物，開始被展示於城市的生活空間中，如由近藤十郎（1877-？）³⁹設計，1911年竣工的基隆郵便局，就以「充滿拜占庭王朝風格的穹窿圓頂、高塔」⁴⁰而聞名，此



圖2 日治時期的基隆郵便局。資料來源：生蕃屋本店發行之明信片，原題為「日新橋與郵便局」。

36 新井卓美，〈基隆竹枝・節錄二首〉，「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8.04.05，1版，「夜涼無處不絃歌，丁字簾中有翠娥。窈窕雞籠山上月，清光偏屬酒樓多」、「月掛天心夜色闌，絃歌歇處漏聲殘。消魂枕上春眠暖，不為潮聲撲岸寒」。

37 「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8.04.05，1版。

38 粘伯山，〈遊基隆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07.28，5版。

39 近藤十郎是總督府的技師，畢業於東京大學建築科，他在台其間（1906-1924）的作品，現存者尚有西門紅樓與台大醫院舊館。

40 黃文德主編，《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頁62，圖4-19基隆郵局的圖片說明。

外，「寬闊的港灣碼頭、典雅的高砂公園、現代的鈴蘭燈與歐美古典建築街道、巍峨壯麗的車站」等，⁴¹ 都可以發現城市景觀的變化。1918年吳阿珠（1886-？）〈基隆即事〉描述的正是這個時期的基隆：

基津一帶海門寬，大廈高樓盡壯觀。旭日旗颺呈盛世，青松綠竹映朱闌。⁴²

大鹽面江（生卒年不詳）的〈基隆港〉亦有類似的表述：

港靜風恬海鏡開，麟排櫛次盡樓台。旭岡決背空明禪，多少檣帆入眼來。⁴³

即使以古典的詩語表現，「大廈高樓盡壯觀」、「麟排櫛次盡樓台」仍能標示出這些西式的樓群，已經成為城市天際線的支配地景。

（三）觀光的場所

日治時期是台灣旅遊活動普遍化的時期，⁴⁴ 基隆則是這個時期島內旅行的重要觀光場所，以實施超過40年的修學旅行為例，「北部旅行以基隆、台北、桃園三地為主。基隆主要是以基隆港為中心，參觀軍艦或軍事演習」。⁴⁵ 事實上，在《臺灣日日新報》中經常可以見到「觀艦」的消息，如1914年5月26日的〈生徒參觀軍艦〉：

停泊在基隆港之須磨軍艦，限至來廿八日內，准各學校生徒，隨意參觀。艚舨公學校生徒四年生以上，詹來廿七日，由各主任教官引率搭車向基隆云。⁴⁶

41 同註40，頁15。

42 吳阿珠，〈基隆即事〉，「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18.01.11，6版。

43 大鹽面江，〈基隆港〉，「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35.11.10，8版。

44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10），頁343。

45 林雅慧，〈「修」台灣「學」日本：日治時期台灣修學旅行之研究〉，頁49。

46 〈生徒觀艦〉，《臺灣日日新報》，1914.05.26，6版。

可以想見，到基隆「觀艦」對當時的人來說應該是個新奇的體驗，而這項活動不僅對學生展示，也開放給一般人，黃純青（1875-1956）在同年的5月27日亦與三名友人從樹林驛出發，專程到基隆「觀艦」，由寓居基津的李石鯨（1882-1944）⁴⁷招待，「行抵



圖3 日治時期的基隆火車站。資料來源：生蕃屋本店發行之明信片，原題為「基隆停車場」。

海岸，望見雄姿颯爽須磨軍艦橫於港中，一同乘雙槳登艦，出名刺，請參觀，軍人導予巡覽，一一說明。竝指艦首燦爛光輝日章旗告予曰：『是征俄戰勝旗也，今日為海軍紀念良辰，故懸之』」，⁴⁸李石鯨與黃純青都有〈觀艦〉詩記此事。⁴⁹

除了「觀艦」外，基隆的市街、歷史古蹟與附近的海岸也是觀光的重點。《基隆市案内》甚至提供了觀光順序的建議，一趟約五小時的海陸觀光行程，由基隆火車站為出發，高砂公園、千人塚、基隆神社、大沙灣海水浴場、旭岡、八尺門、社寮島、蕃字洞、仙洞，最後乘船回到基隆車站，⁵⁰在這裡可供觀覽的景點已被聯結規畫成套裝的旅行路徑，這顯示當時的基隆已是觀光活動發展成熟的場所。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的基隆是台灣首屈一指的繁華港都，而移植自東京的歐化經驗，更讓這個城市無論空間規畫還是指標建物，都充滿著現代／西洋風味，所以在島嶼新興的旅遊活動中，基隆被視為重要的觀光場所。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基隆，卻是源於古典命題的基隆八景詩生產最多的時期。

47 簡萬火，〈李石鯨小傳〉，《基隆誌·附錄》，頁67，「保粹書房教師也，聰穎好學，誨人不倦，才比七步，學富五車，久為壇所瞻仰，每為振興漢學，關心教授，滿地桃李，多出其門焉。」

48 黃純青，〈雞籠紀遊〉，《臺灣日日新報》，1914.07.07，3版。

49 李石鯨，〈雞籠紀遊·觀艦〉，《臺灣日日新報》，1914.07.03，3版，「橫江戰艦擅雄姿，想見衝波破敵時。玄海威名君記否，軍人笑指日章旗」；黃純青，〈雞籠紀遊·觀艦〉，《臺灣日日新報》，1914.07.04，3版，「日章燦爛映朝曦，艦首高懸戰勝旗。野客愛聽兵士語，曾從玄海破俄師。」

50 中島新一郎，〈附近案内·觀光の順序〉，《基隆市案内》（基隆：基隆市役所，1930.12），頁71。

三、從「空間」到「地方」：八景的沿革、意義與發展

日治時期的基隆八景詩多沿襲《淡水廳志》的標目，⁵¹ 李逢時的八景完全被忽略。這與李逢時的詩作在當時的流傳應有一定的關係，因為連橫於藝文掌故的連橫（1878-1936）都稱其詩「沒後遺失。余從蘭人士抄得十數首」，⁵² 所以1933年《詩報》刊載李逢時的八景詩，儼然就有種「重新發現」的意味。換言之，李逢時的八景至少要到1933年才廣為人知。⁵³ 現將當時可見的五種基隆八景整理如后，亦可見其間的差異：

表1 基隆八景的表列

出處／景點	淡水廳志	李逢時	澁谷春濤 (1903)	許梓桑 (1904)	基隆青年同志會 (1928)
奎山聚雨	●	●雞山積雨		●雞山聚雨	
毬嶺匝雲	●		●獅球嶺	●獅嶺匝雲	●獅嶺迎雲
峰頂觀瀑	●		●雙龍瀑	●魴頂瀑布	
鸞嶼凝煙	●	●	●鸞母島	●	
仙洞聽潮	●	●仙洞鳴泉	●仙洞	●仙洞聽濤	
社寮曉日	●	●社寮漁火		●	●社寮銀瀾
海門澄清	●	●八尺澄清	●八尺門	●	
杙峰聳翠	●	●三爪聳翠		●	
燭嶼夜光		●			
人堆戰浪		●	●萬人堆		
大沙灣			●		
吐霓橋			●		
旭丘晴嵐					●
米蕩晚靄					●
八斗夕照					●
靈泉晚鐘					●

51 以標出的地點來看，《淡水廳志》是「奎山」、「毬嶺」、「魴頂」、「鸞嶼」、「仙洞」、「社寮」、「海門」、「杙峰」，與許梓桑的相較，「奎山」與「雞山」、「毬嶺」與「獅嶺」指涉的是同一地點，「聽潮」與「聽濤」、「觀瀑」與「瀑布」的意象則幾乎一致，可知二者間的因承關係。

52 連橫之語轉引自〈泰階詩稿抄本識語〉，《泰階詩稿》（台北：龍文出版社，2001.06），頁1。目前所傳者皆源自日治時期的李碩卿抄本，1956年由其門人李建興贈予宜蘭文獻會，1966年盧世標選其中116題，加入〈銅貢賦〉與連橫《台灣詩乘》所選的4首詩，以「泰階詩集」為名，刊登於《宜蘭文獻》2卷2期，至此，李逢時之詩才得面世。

53 李逢時的八景詩刊載於1933.02.15出刊的《詩報》53期，頁5，題為〈基隆八景〉，為李春霖所編的「遺稿」。

堵橋秋月					●
暖暖春水					●

由上表可知，1903年日人澁谷春濤也選了八景，從〈題自畫雞籠八勝圖〉⁵⁴的詩題看來，其詩應是題於圖繪之上，他的八景之目分別是——「獅球嶺」、「雙龍瀑」、「鸞母島」、「大沙灣」、「八尺門」、「仙洞」、「萬人堆」、「吐霓橋」，顯然，這組自選的八景，並沒有引起迴響，1913年《臺灣日日新報》中有關〈台灣八景〉的專論中，提到「台灣北部又有雞籠八景，鸞嶼凝煙、社寮曉日、海門澄清、杙峰聳翠、奎山驟雨、毬嶺匝雲、魴頂觀瀑、仙洞聽濤」，⁵⁵仍然是以《淡水廳志》的標目為依歸，可以說這組基隆八景在日治時期是得到時人普遍認同的。1904年在《臺灣日日新報》集中出現的十二組基隆八景詩，也多沿襲其標目。⁵⁶

八景的文化傳統，一般認為始自十一世紀中葉宋迪（1015-1080）創制的

54 澁谷春濤，〈題自畫雞籠八勝圖〉，「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3.11.20，1版，「獅球嶺聳自成關，腳底晴分十八灣。一道火輪排雲幕，黑烟吹過翠嵐間」（獅球嶺）、「忽驟韞韞天外聞，此聲應識石基分。此地為石碇基隆二堡之界一雙飛瀑雙龍出，白霧散成二堡雲」（雙龍瀑）、「一潭千戶岸頭樓，鸞母島邊沽舶浮。半夜逍遙水天靜，月明十有二峰秋」（鸞母島）、「却火迹消波莫痕，孤墳十字舊渾存。寒烟一路平沙晚，秋在英雄埋骨村」（大沙灣）、「八尺門留鬼削工，內洋更與外洋通。春漁秋獵舟來往，滿艙魚香晚靄中」（八尺門）、「湖迫奇巖生浪花，洞門雲濕識龍過。醉人喧鬧春也暮，天女祠邊夕照多」（仙洞）、「怒浪噴崖去又回，奇巖洗出萬人堆。前頭放眼布帆影，外過鵬程九禹來」（萬人堆）、「舟渡艱難夢一場，架橋工就聖明光。浴餘仙洞涼堪迫，斜照半灣虹影長」（吐霓橋）。

55 讀古村莊主人，〈台灣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13.10.31，13版。

56 這12組基隆八景詩分別是沈相其，〈基隆八勝〉，「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15，1版；張一鶴，〈基隆八景〉，「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19與04.20，1版；乃蘭氏，〈基隆八勝〉，「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2，1版；蔡一靜，〈基隆八景〉，「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01與05.03，1版；蔡耀垣，〈基隆八勝〉，「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15，1版；作舟氏，〈基隆八景〉，「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17，1版；江蘊和，〈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6.14，1版；張昭德，〈基隆八景〉，「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1，1版；乃蘭，〈基津八景〉，「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2，1版；呂致知，〈基隆八勝〉，「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22，1版；許敬軒，〈恭步江蘊和詠基津八景芳韻〉，「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12.15，1版。此外，還有節錄者，許松英，〈基隆八景節錄·仙洞聽濤〉，「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22，1版；林孝松，〈杙峰聳翠〉，「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22，1版；林孝松，〈鸞嶼凝煙〉，「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22，1版；林孝松，〈社寮曉日〉，「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22，1版；林孝松，〈海門澄清〉，「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22，1版；林孝松，〈魴頂瀑布〉，「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22，1版。

〈瀟湘八景圖〉，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瀟湘八景屬於一種意境的命題，如同石守謙所指出的「宋迪的品題不從特定地點出發，而自較具普遍性的物象開始，即與其意境設定息息相關」，⁵⁸ 換言之，瀟湘八景所關注的是意境，而不著意於特定地點。但後世的八景，⁵⁹ 以基隆八景為例，「雞山」、「杙峰」、「鰲嶼」、「魴頂」、「仙洞」、「社寮島」、「八尺門」、「獅球嶺」都是針對具體的地點命題，所以僅由瀟湘八景切入，似乎不能充分把握八景文化傳統的特質。

針對這一點，金文京關於八景與十景的討論，就相當值得借鑑。金文京認為八景之名，是取自道教，「原是仙人之乘輿，用以飛行天上。游仙之地，轉為佳景」；⁶⁰ 十景則源於佛教的十境、十乘，是「遊歷風景之中，寓悟道階梯之意」，⁶¹ 所以不論八景還是十景，在山水漁樵之樂中都蘊含著傳統的遊仙與隱居思想。然而，八景與十景之間仍是有區別的，「八景只取境界，不管其名；十景則境地兼而有之。後來模仿八景者，無不有特定地點，名為八景，實則十景之延續」，⁶² 也就是說後世的八景，其實是融合了八景原有的意境命題與十景兼具導遊作用的概念，二者共同建構了一種適合「市隱」⁶³ 的典範風景。

57 關於瀟湘八景的討論，可參見衣若芬，〈宋代題「瀟湘」山水畫詩的地理概念、空間表述與心理意識〉，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詮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12），頁325-372。

58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頁97。

59 板倉聖哲，〈作為東亞圖象的瀟湘八景圖——十五世紀朝鮮前期文人所見到的東亞瀟湘八景圖〉，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1.03），頁168，「不僅在中國，在日本與韓國，八景也經常成為詩歌吟詠及繪畫描繪的對象。在這三個國家當中，也產生了從瀟湘八景中衍生出來的，發現各地八景的現象」，可知中日韓三國都從瀟湘八景中，衍生出各地不同的八景。此外，讀古村莊主人，〈台灣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13.10.31，13版，亦稱「我國於此有近江八景、金澤八景。」

60 金文京，〈西湖在中日韓——略談風景轉移在東亞文學中的意義〉，《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頁143-144，其以陶弘景《真誥·甄命授第一》中的「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對於八景之數的產生，提出有力的論證。此說已得到相當多學者的認同，如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頁96，就認為金文京的說法頗值得參考。

61 金文京，〈西湖在中日韓——略談風景轉移在東亞文學中的意義〉，《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頁144。

62 同註61，頁145。

63 James Cahill（高居翰）著，洪再新等譯，《詩之旅：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2.10），頁40-41，對於「市隱」的產生與特質有精闢的闡述，其說認為南宋時期的杭州，因城市的高度發展，而讓居住其間的居民產生一種失落感，失落了人對自然的親近之感，而透過詩歌與

從基隆八景的地點分布來看，「雞山」、⁶⁴「獅球嶺」⁶⁵是環繞城市周邊的山嶺，「杙峰」、⁶⁶「鰲嶼」⁶⁷則懸浮於基隆港附近的海上，「魴頂」⁶⁸靠近八堵隧道，「遠離市區又隱蔽」，⁶⁹「仙洞」、⁷⁰「社寮島」、⁷¹「八尺門」⁷²皆須換船而行，可以發現它們全都位於城市的邊緣，換言之，基隆八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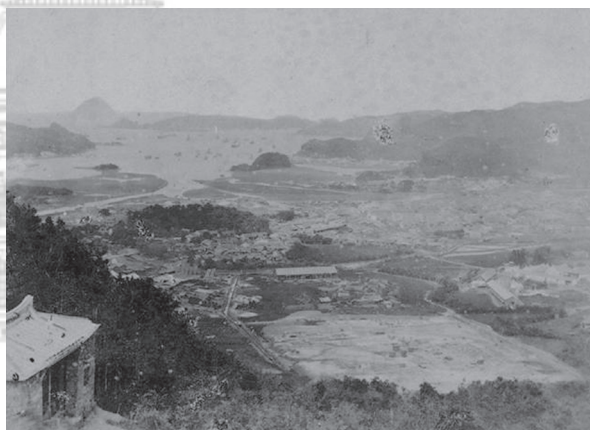
繪畫所描繪的憧憬，則可以讓人與自然的相融，失而復得，只是「貫穿於詩和繪畫背後的信念，是意欲這樣去生活的渴望，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也只是作為一種提神醒腦的想法存留在那些忙於經商和仕宦者的腦海中。這是一個『朝隱』和『市隱』觀念產生的時代，那曾經是『貴族所專有』的，而這時已在上層社會中迅速散佈。」

- 64 雞山就是雞籠山，今稱基隆山，位於基隆的東南側。顏笏山，〈登雞籠山〉小序，「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13.11.04，3版，「此山為該處諸山冠，居人罕臻絕頂，同行頗疑其不能達目的地，卒能遂願」，可知雞籠山並非遊人輕易可至。
- 65 獅球嶺是位於基隆西側的山嶺，登其地可以俯瞰整個基隆港灣，參見註35所引的陳薰南，〈九月十九日登獅球嶺〉。
- 66 杙峰就是今日的基隆嶼，又稱基隆島，「議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11.11，2版，「由港口東北相距二里半之處，有基隆島」，當時由基隆港往來台日之間，都會經過基隆嶼，如豬口安喜，〈船中雜詩〉，「南瀛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20.07.22，3版，即稱「宛召長揖歡吾至，當面杙峯是故人。」
- 67 鰲嶼指的是原居基隆港灣內的鰲公島與鰲母島。豬口葆真，〈弔鰲嶼〉自注，「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8.04.03，1版，「鰲公鰲母二嶼，點綴于基隆灣。饒多風致，鰲嶼凝烟，八景之中推為翹楚。近因築港及市區改正工事，以火藥力為崩壞之」。又據〈基隆築港局現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11.14，2版，「現該局所實行者，為築岸壁，削鰲母島」；〈毀鰲公島〉，《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1.19，5版，「橫於基隆港停車場前海中之鰲公島，其妨害船舶往來者，不一而足。該地工事支部，擬本年度著手除棄」，可知鰲公島與鰲母島分別在1909年與1907年時，因基隆港的築港工程而被削平。
- 68 位於今南榮公墓內，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地名辭書》，卷17（南投：省文獻會，1996.12），頁160，「魴魚是一種體型圓圓的魚，因本庄所在地，為四週的山崗所繞，形如魴魚，故名魴頂庄」、「魴頂溪流會合後，以瀑布的形式傾瀉而下，在今集善祠旁形成瀑潭，此瀑布台灣人稱為魴頂瀑布，瀑潭稱為魴窟；日本人則稱此瀑布為『瀧川瀑布』，曾選為基隆八景之一」。這個地區在日治時期，被規畫為「瀧川靈園」，土地被徵收，因而廢庄，戰後改稱南榮公墓。
- 69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地名辭書》，卷17，頁161。
- 70 仙洞在清代、日治時期，甚至到今日都是基隆著名的觀光景點，簡萬火，《基隆誌》，頁24，「仙洞窟，是洞在市之北端，距驛口十五町。斷崖削壁之際，突有一大洞窟。洞之內，安置觀音菩薩，洞中更有三小洞」。需要說明的是日治時期的仙洞，必須換舟而行，如林癡仙，〈基隆仙洞〉，「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9.08.11，1版，即言「打槳來尋小洞天，洞深不見古時仙」；陳槐澤，〈基隆仙洞〉，「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9.08.11，1版，「欲訪桃源一問津，停船洞外水粼粼。」
- 71 社寮島即今日基隆的和平島，原與台灣本島間隔著八尺門水道，1935年日人在此興建全台第一座跨海大橋「基隆橋」，通過這座鋼筋混凝土平橋，社寮島才與台灣相連。簡萬火，《基隆誌》，頁28，「社寮島周圍僅里許，浮立港口。四百年前，日本足利時代之末，大和民族，初到該島，即其為第一步之所也。近為琉球人漁夫，並本島人混成一部落，與基隆市內，略別一天地也。因其風景好處，故得選入基津新舊八景中。」
- 72 八尺門即八尺門水道，是社寮島與台灣本島之間的狹窄水道，以海水清澈見底，能望見魚群游泳而聞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10.26，4版，有八尺門的介紹，「八尺門海底澄清魚類游泳，及海底之自然儘可望見」。此外，豬口鳳庵，〈八尺門〉，「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6.03.20，1版，「奇壁立海門涯，東北風濤半面遮。月逐奔潮光閃爍，萬條金箭射銀沙。」

正符合金文京所說的，是能承載「市隱」理想的「城市小景」。⁷³

然而，將這組基隆八景對照前述澁谷春濤的八景，可以發現二者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標目的命名。澁谷春濤只標出地點，前者的八景之目卻在地點之外，又分別擇定了八個物象——烟（鸞嶼凝煙）、日（社寮曉日）、海（海門澄清）、樹（杙峰聳翠）、雨（雞山聚雨）、雲（獅嶺匝雲）、瀑（魴頂觀瀑）、濤（仙洞聽濤），這是對於每一個地點，提供了觀覽的建議，例如「鸞嶼凝煙」意謂著鸞嶼的極致之境，是在煙霧繚繞之時，「社寮曉日」則表示社寮島的最佳風景是日出破曉，通過這種地點與物象的連結，自然風景被賦予了人文意涵，基隆八景不僅只是八個值得遊覽的地點，也是如畫風景（the Picturesque）的八種極致之境。

日治時期，當基隆逐漸成為「繁華第一地」⁷⁴時，當觀光成為人們來到這個城市的重要活動，基隆八景於是被視為一種遊覽指南，⁷⁵與「觀艦」之類的活動不同，八景喚起的是觀景者對於「市隱」理想的一種憧憬，如同園林的功能，八景可以讓人同時享受山水之勝與城市之便，具有經濟能力的人可以在城市建置園林，但一般人則只能用城市邊緣的八景取代園林，藉此逃離城市的喧囂擁擠。所以他們總是沿著指引，站在最佳的觀景點，安靜地凝視經過選擇的如畫風景，並領略其中的意境。這或許也促使這個時期基隆八景詩的大量出現。



這組八景書寫在1907年 圖4 1896年的鸞嶼凝煙。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

73 金文京，〈西湖在中日韓——略談風景轉移在東亞文學中的意義〉，《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頁149-150。

74 「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8.04.05，1版。此外，如註29所指出的，1903年時基隆即已超越淡水，成為全島第一大港。

75 簡萬火，《基隆誌》，頁17，在「基隆名勝舊跡」中，就列出「雞籠八景」，並以許梓桑的組詩為例證，即可知八景在此扮演名勝舊跡的角色，是可供尋訪的遊覽地點。

宣告結束，因為築港工程的緣故，「鸞嶼凝煙」中的鸞公島與鸞母島，在兩年間先後被削平，已經不在場的鸞嶼自然無法成為八景的遊覽地點。1909年瀛社沈相其（1853-1918）的〈基隆八景前刊刻日報現鸞嶼築港削平僕本擬一代之反得其三湊為十〉，⁷⁶提出要以「人堆戰浪」、「海上漁火」、「盤嶼浪花」取代鸞嶼，並改八景為十景。1910年在基隆舉行的瀛社例會中，曾以〈人堆戰浪〉為課題，用意在於「基隆八景，因鸞嶼除去，已失鸞嶼凝煙一景，此後或以此人堆戰浪一景補之，意未可料。擬此為題，蓋亦為樹先聲」，⁷⁷不過並未引起廣泛的迴響。⁷⁸

1928年為了慶祝昭和天皇（1901-1989）的即位大典，⁷⁹基隆青年會推出「基隆八景」的票選活動，活動的方式是由民眾以明信片投票，再由審查長松本虎大（生卒年不詳）與審查委員共同決定，這組新基隆八景是——「旭岡晴嵐」、「暖暖春水」、「社寮銀瀾」、「米甕晚霞」、「獅嶺迎雲」、「八斗夕照」、「靈泉晚鐘」、「堵橋秋月」，⁸⁰其中「旭岡晴嵐」是《臺灣日日新報》選出的新台灣八景之一，「社寮銀瀾」、「米甕晚霞」、「獅嶺迎雲」則源於舊八景的「社寮曉日」、「仙洞聽濤」、「獅嶺匝雲」，只是這組新



圖5 1912年的魴頂瀑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編，《臺灣鐵道案内》（台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12），頁113，原題為「雙龍瀑布」。

76 沈相其，〈基隆八景前刊刻日報現鸞嶼築港削平僕本擬一代之反得其三湊為十〉，「藝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09.02，3版。

7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6.28，5版。

7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雖有多首題為〈人堆戰浪〉的詩作，但這些作品全集中於1910年7月的〈瀛社詩壇〉，可知皆屬於瀛社的課題詩。惟此後罕見同題詩作，也未有將其再列於基隆八景者，可知以〈人堆戰浪〉補足八景之缺，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迴響。〈人堆戰浪〉的相關詩作，參見「瀛社詩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7.20，4版，有高峻極、林希文、賴拱辰之作；「瀛社詩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7.23，4版，有李金燦、黃純青、曾首三、倪炳煌之作；「瀛社詩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7.26，4版，有黃玉階、葉鍊金、王子鶴、葉菊如之作；「瀛社詩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7.27，4版，有謝雪漁、葉汝馨、陳澄秋之作。

79 1926年大正天皇過世，皇太子裕仁即位，該年並未舉辦登基大典，1928.11.10才在京都御所舉行典禮，當時稱之「御大典」。〈今秋御舉行御大典的盛儀〉，《臺灣日日新報》，1928.01.03，2版，就對御大典的儀式與程序有詳細的介紹。

80 〈基隆青年同志會選定基隆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28.12.18，7版。

八景從投票開始，台灣人的參與意願就不高，⁸¹選出後亦少見著錄，⁸²遠不及舊八景的廣為人知。

四、凝視理想山水：基隆八景詩的勝景書寫

基隆八景詩指的是以八景為主題的系列詩作，作為文學文本，基隆八景詩如何凝視（gaze）與再現（representation）眼前的風景？而這種勝景書寫，又會對八景地方感的形塑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問題的釐析將能幫助我們理解基隆八景與文學之間的關係。

（一）框定式的觀看

八景的命題，除了景點的選定外，亦在該地的各式物象中，獨選一種，其餘皆捨去，形成一種框定式的觀看。八景的書寫沿承這種命題，只能針對八景的獨選之境進行闡釋，以許梓桑著名的〈基津八景〉為例：⁸³

鷄山屹立冠羣峰，風雨瀟瀟聚幾重。極目微茫迷鳥道，高低雲樹匝陰濃。

（鷄山聚雨）

指顧獅峰曙色分，朝朝嶺上匝浮雲。山容隱約誰能辨，絕巘高巖盡綺紋。

（獅嶺匝雲）

雙龍飛瀑落岩中，入耳泉聲玉韻通。任爾狂風吹不斷，銀河遠上瀉天空。

（鯨頂瀑布）

8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28.10.26，4版，有標題為〈基隆八景投票，島人無幾〉的報導，其中提及「目下所投票者，概係內地人，島人則寥寥無幾」，可知台灣人對於新基隆八景的投票，參與意願不高。

82 在日治時期，簡萬火，《基隆誌》，頁18-22，將其錄於「基隆名勝舊跡」。其餘出版時間在新八景產生之後的著作，如加藤守道的《基隆市》、中島新一郎的《基隆市案內》都未提及，而且後二者在介紹基隆名勝時，仍以舊八景為據。以社寮島為例，加藤守道就稱「這個地方是基隆八景社寮曉日所在的地點」，頁28，中島新一郎也說「此地是基隆八景社寮曉日的所在地，左邊是屹立於萬人堆鼻之上的是基隆燈塔」，可以發現他們都未談到新八景的「社寮銀瀾」。

83 乃蘭，〈基津八景〉，「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2，1版。許梓桑字迺蘭，但亦常署名乃蘭發表作品。這組基隆八景詩應該是相關主題詩作中最著名的，只要提及基隆八景，引用的幾乎都是這組八景詩，如簡萬火《基隆誌》，頁17-18，將其作為鷄籠八景的例證。但許梓桑除了這組七絕的基津八景，另有五絕的基隆八勝，只是罕為人知，參見乃蘭氏，〈基隆八勝〉，「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2，1版。

雌雄鶯嶼海西東，毓秀鍾靈氣象同。樹色迷茫疑欲雨，憑欄一望碧烟籠。

（鶯嶼凝煙）

空留石洞隱仙踪，髣髴桃源一樣同。海國波濤長擾夢，聲聲入耳聽玲瓏。

（仙洞聽潮）

旭日東升彩鳳鳴，雲霞散漫曉風生。天開曙色朦朧映，水國清光入畫明。

（社寮曉日）

門開八尺本天成，萬古長流一色清。好是晚來霞爛熳，魚穿雲錦漾分明。

（海門澄清）

萬水星羅繞杙峰，杙峰不與眾山同。孤高千仞凌霄漢，一望蒼茫鎮海東。

（杙峰聳翠）

由作品的寫法來看，可以發現，每一首詩都被框定於地點與物象交接的視域中，「鷄山屹立冠羣峰，風雨瀟瀟聚幾重」是「鷄山聚雨」的點題，然後再牽引出眼下所見的「極目微茫迷鳥道，高低雲樹匝陰濃」；「指願獅峰曙色分，朝朝嶺上匝浮雲」中已嵌入「獅嶺匝雲」的主題，「山容隱約誰能辨，絕巘高巖盡綺紋」則進一步描摹山層雲秀的地理景觀。如何通過框定的角度去擬寫八景的極致意境，顯然是書寫者關注的焦點，只是這種單單選取特定物象的方式，無可否認，也讓地景書寫中許多重要的元素被排除了。

比如社寮島的人文景觀，在日治時期經常是獵奇之眼捕捉的對象，《基隆誌》稱其「近為琉球人漁夫，並本島人混成一部落，與基隆市內，略別一天地也」，⁸⁴ 猪口葆真（1864-？）⁸⁵ 亦有多首詩描寫當地的景觀，順著他的眼光看去，那裡是「漢番雜處水雲村，六七家臨八尺門」、⁸⁶ 「簾門茅屋枕平沙，路

84 簡萬火，《基隆誌》，頁28。

85 猪口安喜，字葆真，號鳳庵，福岡人，明治28年（1895）來台，昭和7年（1932）因老歸鄉，長期任職警界，在台期間，加入南雅社。《臺灣日日新報》，1932.02.16，8版，有其生平簡述，「猪口氏，自明治二十八年來台，多年投入警界，累進而為警視退官。然其人則博學，恂恂儒者，人格上無一點瑕疵。當上山總督之時，受特知入秘書課，又先後助修台灣史乘。近以老來侵尋，自行告退，決定本月二十三日欲歸其鄉里福岡。」其發表漢詩，名、字與號兼用，本文為求前後一致，將之統一為猪口葆真。

86 猪口葆真，〈社寮島〉，「藝苑」，《臺灣日日新報》，1906.03.20，1版。

按漁磯一綫斜。媼理釣絲翁補網，曉來忙煞徧家家」，⁸⁷ 可知在觀者眼前的是如此新奇的世界。但是，基隆八景詩卻受限於命題，只能獨取曉日一景，以張一鶴（生卒年不詳）的〈社寮曉日〉為例：⁸⁸

環流小島麗晨光，萬頃琉璃曙色蒼。笑指東溟收宿霧，一輪曉日浴扶桑。

這首詩的前兩句既點時間，又點空間。時間是清晨，空間是海潮繚繞的社寮島，面對著水波盪漾、天色欲明的景況。後兩句則直接扣題「曉日」，由視覺著筆，寫宿霧消散，朝陽東昇的剎那。其餘如「海嶠金烏起，輪開日色紅。漫天雲錦散，曙色有無中」、⁸⁹「曉日初升照碧流，浪花萬頃滾金毬。漫言光徹滄江裏，一上雲霄耀九州」等，⁹⁰ 都圍繞在相同的意境中。

事實上，不只「社寮曉日」，其餘的七景，無論怎麼變化，仍然只能書寫被框定的特定物象。換言之，基隆八景詩所要呈現的並非現實意義的某個景點，而是一種如畫風景的展示，如「遶樹晨煙呈曙色，漁舟欸乃畫圖中」、⁹¹「天開曙色瞳朦映，水國清光入畫明」⁹²、「山靈不放畫圖看，谷底崖陰積雨寒」、⁹³「宿鷺驚飛煙際出、一圖畫景水中天」⁹⁴ 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被框定的如畫風景中，人為活動的元素往往被排除或刻意降低其重要性，書寫者關注的是如何將詩中的景物美化，進而營造身臨畫中的感受。

（二）理想山水的形塑

在中國繪畫中有具象山水與理想山水的區別，⁹⁵ 瀟湘八景原就屬於追求詩

87 豬口葆真，〈社寮島竹枝詞〉之五，「藝苑」，《臺灣日日新報》，1906.04.21，1版。

88 張一鶴，〈基隆八景·社寮曉日〉，「藝苑」，《臺灣日日新報》，1904.04.19，1版。

89 乃蘭氏，〈基隆八勝·社寮曉日〉，「藝苑」，《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2，1版。

90 沈相其，〈基隆八勝·社寮曉日〉，「藝苑」，《臺灣日日新報》，1904.04.15，1版。

91 張昭德，〈基隆八景·社寮曉日〉，「藝苑」，《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1，1版。

92 乃蘭，〈基津八景·社寮曉日〉，「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2，1版。

93 許敬軒，〈恭步江蘊和詠基津八景芳韻·鷄山聚雨〉，「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12.15，1版。

94 呂致知，〈基隆八勝·鸞嶼凝煙〉，「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8.20，1版。

95 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桃花源意象的形塑與在東亞的傳佈〉，《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頁50，「對於實地景觀的圖繪雖然自古以來一直都存在於山水畫的領域之中，但它並非

意與去物質的詩意畫系統，⁹⁶ 其所形構的正是一種理想山水。⁹⁷ 八景詩繼承這樣的模式，即使根源於特定地方的實景，在表現上卻不僅限於再現景物的層次，而更多著意於形塑書寫者心中的理想山水，以蔡耀垣（生卒年不詳）的〈基隆八勝〉為例：⁹⁸

雞山高插入雲峰，烟雨迷濛失嶽容。頃刻甘霖施四野，方知望澤不違農。

（雞山聚雨）

飛泉噴玉碧潺潺，勢似長虹落遠山。日夜奔流驚過客，誤看雲錦掛人間。

（鯢頂瀑布）

獅嶺峰高一望雄，無端頂上氣融融。濃雲萬疊迷芳徑，恍入天臺路不通。

（獅嶺匝雲）

洞口霞蒸草色暄，此中佳景勝桃源。仙蹤未卜棲何處，惟聽怒濤曉夜喧。

（仙洞聽濤）

天降杙峰湧碧流，昂然獨立翠凝眸。行船月夜多驚訝，誤認蓬萊此地留。

（杙峰聳翠）

當前鸞嶼送青來，何意雌雄忽兩開。夜靜烟凝人不見，應教同夢入陽臺。

（鸞嶼凝烟）

曉望朝陽掛海東，恍然金鏡浪搖紅。須臾移入雲端上，共樂光天化日中。

（社寮曉日）

八尺海門鬼斧開，此中澄澈水潏徊。何緣乃得清如許，疑是瑤池湧下來。

（海門澄清）

主流。絕大多數的山水畫，不論是屬於早期歷史中的『仙境山水』或是較晚成為發展主軸的『隱居山水』，都是經過『理想化』的完美山水形象的呈現，可知中國的山水畫可區別為具象山水與理想山水，並且以理想山水為主流。

96 James Cahill（高居翰）著，洪再新等譯，《詩之旅：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頁9，亦指出瀟湘八景，「通常被認為是宋代詩意繪畫的典範。」

97 石守謙，〈勝景的化身——瀟湘八景山水畫與東亞的風景觀看〉，《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頁105，「這八個意境經過此番圖象轉化後已經脫離特定地景的約束，不再專屬於瀟湘，轉而成為山市、漁村、雨雪等平凡物象昇華出來的理想化形象，而八景之圖式也因此成為可以運用到任何一般風景觀看、框定其意境的圖繪手法。」

98 蔡耀垣，〈基隆八勝〉，「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15，1版。

可以發現，在這系列組詩中，除了前述的如畫風景外，亦出現大量能引起仙境／隱居想像的用語，如「天臺」、「蓬萊」、「陽臺」、「桃源」、「瑤池」等，從這裡可以看出書寫者是有意識地將基隆八景予以「理想化」，更確切地說，這些風景其實是書寫者心中理想境界的呈顯。在基隆八景詩中，這種理想境界又可區分為「仙境山水」與「隱居山水」兩種類型，試分述於后：

1. 仙境山水

在八景書寫中，美好的如畫風景經常被比擬為世外仙境，比如蔡一靜（生卒年不詳）的〈杙峰聳翠〉：⁹⁹

海外高峰接紫霄，浮嵐積翠望迢迢。洪濤巨浪衝千古，猶是擎天柱不搖。

這首詩開頭兩句便將杙峰安置在飄渺遼闊的空間中，獨立「海外」，點出仙境的遠隔，碧峰出海面的形構，則彷彿《列子》中漂浮海面的神山，¹⁰⁰是「上帝揀作仙人居」¹⁰¹的所在。後兩句著意在時間，洪濤巨浪猶如時間的具象，「衝」字強調了這種推移變動的劇烈，而杙峰的「擎天」、「不搖」，顯然暗示了神山樂土的永恆不變。

除此之外，「仙洞聽濤」中的「仙洞」，亦彷彿神仙淨土，如「洞裏仙人隱，山高景又清。雲封蘚翠滴，時聽海濤聲」，¹⁰²「石洞幽清雅欲仙，雲霞燦爛照彌天。櫓聲未了輕舟泊，斜聽濤聲鬧不眠」，¹⁰³連「獅嶺」也被指認為仙鄉所在——「亂山高下笑春風，却怪獅球嶺不同。解說此間仙子隱，長懸雲幕鎖斜紅」，¹⁰⁴可以發現基隆八景詩試圖將這些城市近郊的景點轉化為仙

99 蔡一靜，〈基隆八景·杙峰聳翠〉，「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03，1版。

100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湯問》（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10），頁115，「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入，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可知這五座仙聖所居的神山都是漂浮在海面上的。

101 李賀，〈神仙曲〉，《李賀詩集·外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03），頁368。

102 乃蘭氏，〈基隆八勝·仙洞聽濤〉，「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2，1版。

103 作舟氏，〈基隆八景·仙洞聽濤〉，「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17，1版。

104 張一鶴，〈基隆八景·獅嶺匝雲〉，「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0，1版。

境。然而，在這仙境化的過程中，雲氣與烟霧顯然是不可或缺的意象，¹⁰⁵ 它們在八景詩中頻繁的出現——「獅嶺匝雲」當然是「氤氲凝聚嶺西東」、¹⁰⁶ 「浮雲萬壘溟濛合」、¹⁰⁷ 「濃雲萬疊迷芳徑」；¹⁰⁸ 但圍繞著「雞山」的亦是「曉來雲氣衝峰起」、¹⁰⁹ 「油然天外雲龍現」、¹¹⁰ 「絕頂近天烟霧積」，¹¹¹ 換言之，這些雲氣與烟霧猶如仙境之氣，它們的旋繞瀰漫，使這些景點迥異於現實塵世，讓人有置身仙境之感。

2. 隱居山水

基隆八景詩還經常將眼前所見的山水，投射成理想的隱居之地，如張昭德（生卒年不詳）的〈社寮曉日〉：¹¹²

朝曦初起海雲東，萬頃波平漾碧空。遶樹晨煙呈曙色，漁舟欸乃畫圖中。

這首詩起筆即點「曉日」，作者用「朝曦」、「海雲」兩種物象來表顯旭日初升的麗景，次句寫碧空中浮雲的「萬頃」與「波平」，取景宏闊。後二句則轉寫晨光中的社寮島，烟靄繞樹、漁舟欸乃，這片清幽閒澹的畫景，透露了作者心情的和樂安寧，正是典型的漁隱之境。

又如沈相其（1853-1918）的〈鸞嶼凝煙〉：¹¹³

極目當前碧水灣，雌雄鸞嶼鎮相關。烟凝翠蓋添佳氣，沙上羣鷗日往還。

105 巫鴻著，梅玫譯，〈玉骨冰心：中國藝術中的仙山概念和形象〉，《時空中的美術：巫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集》（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0.06），頁137-138，認為仙山圖象有兩重要素——「奇峰」和「雲氣」。而其所指稱的「雲氣」意涵，則可收攝本文所言的雲氣和烟霧。

106 蔡一靜，〈基隆八景·獅嶺匝雲〉，《臺灣日日新報》，1904.05.01，1版。

107 沈相其，〈基隆八勝·獅嶺匝雲〉，《臺灣日日新報》，1904.04.15，1版。

108 蔡耀垣，〈基隆八勝·獅嶺匝雲〉，《臺灣日日新報》，1904.05.15，1版。

109 張一鶴，〈基隆八景·雞山聚雨〉，《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0，1版。

110 呂致知，〈基隆八勝·雞山驟雨〉，《臺灣日日新報》，1904.08.20，1版。

111 江蘊和，〈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雞山聚雨〉，「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6.14，1版。

112 張昭德，〈基隆八景·社寮曉日〉，「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1，1版。

113 沈相其，〈基隆八勝·鸞嶼凝煙〉，「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15，1版。

首句鋪展出的，是一片碧水溶溶的海灣，第二句點明雌雄鸞嶼的所在。接著，扣寫題意的「凝烟」，蒼茫的烟水之間，只見羣鷗日日往還。全詩的景緻清麗曠遠，鷗鳥意象的運用，更讓其增添了一種悠然自適的氛圍。因為鷗鷺在中國文學中，原就具有無機忘俗的意涵，是隱居的重要象徵，¹¹⁴ 基隆八景詩時時出現的鷗鷺意象，如「輕煙散盡沙鷗去」、¹¹⁵ 「日見羣鷗自往還」¹¹⁶、「潮起驚宿鷺」、¹¹⁷ 「宿鷺驚飛煙際出」等，¹¹⁸ 讓其呼應著棲居江湖，以漁為隱的文化傳統。

除了前述的漁舟、鷗鷺外，「牧童牛背橫吹笛，唱罷山歌日已西」、¹¹⁹ 「最愛淵明眠醉石，醒來觀瀑在廬山」、¹²⁰ 「亂煙籠砌漁人出，宿露未乾耀太空」、¹²¹ 「仙蹤曷敵漁翁影，泛棹江潯宿醉醒」、¹²² 「雌雄並峙關情甚，忙殺漁人下扁舟」等，¹²³ 也都能展現隱居的理想，如同James Cahill所指出的，「漁夫、樵子、牧童和農民的作用，如我在別處所提出的，很大程度上類似於歐洲的田園意象，代表著一種過去的、不可回復的阿卡迪亞式的質樸單純」，¹²⁴ 可以發現，基隆八景詩的書寫者也透過這種視角，觀看、描摹他們所遭遇的美好風景。

五、八景對基隆書寫的影響

1907年因築港工程的緣故，「鸞嶼凝煙」被毀壞了，這也同時宣告基隆八景的終結。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八景雖然表面上瓦解消失了，但它的影響力卻

114 陳淑君，〈稼軒詞中鳥意象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頁57-58，「因為鷗是忘記機心的象徵，白鷺是高潔品格的化身，因此在文學裡，文人雅士往往將鷗鳥和鷺並提」、「鷗和鷺以其素潔高尚的羽色，詩詞裡往往被視為隱士的知音良伴。」

115 作舟氏，〈基隆八景·鸞嶼凝煙〉，「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17，1版。

116 江蘊和，〈和梓桑君詠基津八景·杙峰聳翠〉，「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6.14，1版。

117 乃蘭氏，〈基隆八勝·鸞嶼凝煙〉，「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2，1版。

118 呂致知，〈基隆八勝·鸞嶼凝煙〉，「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8.20，1版。

119 張昭德，〈基隆八景·獅嶺匝雲〉，「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7.01，1版。

120 許敬軒，〈恭步江蘊和詠基津八景芳韻·魴頂瀑布〉，「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12.15，1版。

121 作舟氏，〈基隆八景·社蔡曉日〉，「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17，1版。

122 蔡一靜，〈基隆八景·海門澄清〉，「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5.03，1版。

123 張一鶴，〈基隆八景·鸞嶼凝煙〉，「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4.04.20，1版。

124 James Cahill（高居翰）著，洪再新等譯，《詩之旅：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頁52-53。

始終存在，這種現象或可由其對基隆書寫的滲入來理解。以下我們就以不在場（absent）的鸞嶼、在場（presence）的社寮島與仙洞，分別進行說明。

（一）不在場的鸞嶼

當鸞嶼消失之後，頗有意思的是，被摧毀了的物質存在物所留下的虛空（void），反而觸動了書寫者對於往昔的追憶，黃純青在〈雞籠紀遊〉中就曾提及：

忽憶昔日東遊，曾經此地，記得有雌雄二鸞嶼在焉。急詢李君，答云浚港時，已比翼高飛矣，問其遺跡，指點在滄波之間。聞之無限今昔之感。¹²⁵

在這段描述中，可以發現即使已經看不見鸞嶼的風貌，可是「憶」與「記得」的行動，召喚了記憶中的往事與消失的物象，如同Stephen Owen（宇文所安）所指出的，「喪失的東西、不復存在的東西和被丟棄的東西，它們就像是拖把，在歷史的書頁上用力擦拭。因為我們渴望要『存在』——在有形的物體內，在著作裡，在作品中——我們絕不可能無動於衷地把經過抹拭的地方簡單地看作一片空白」，¹²⁶也就是說，人在本質上是渴望存在、被記得的，過去曾經看過的東西，消失不見了，彷彿許多在時間中被湮沒的人事與物象，由此而引發所謂的「今昔之感」。

事實上，面對不在場的鸞嶼，這種「今昔之感」幾乎是書寫者一種普遍性的情感反應，如李石鯨的〈弔鸞嶼〉：

無復凝煙會水隈，雌雄遭劫總堪哀。劇憐輪與雙棲燕，比翼高飛去復來。¹²⁷

125 黃純青，〈雞籠紀遊〉，《臺灣日日新報》，1914.07.07，6版。

126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11），頁23。

127 李石鯨，〈雞籠紀遊·弔鸞嶼〉，《臺灣日日新報》，1914.07.03，3版。

又如豬口葆真的〈弔鸞嶼〉：

爆聲雷轟起地中，天驚石破捲狂風。從此橫陳長已矣，千秋伉儷奈難恃。

寄語別鳳與離鸞，浮生須作蜃樓看。潮來官渺日之夕，祇有依舊凝烟碧。¹²⁸

上述的詩作，明顯可見「凝煙」依舊，而「鸞嶼」卻是「雌雄遭劫總堪哀」、「千秋伉儷奈難恃」，換言之，鸞嶼的不在場，不僅未讓意義消解，反而使其封存在過去、在回憶裡，這種存在很接近巫鴻所指稱的「墟」，「『墟』不由外部特徵去識別，而被賦予一種主觀的實在（subjective reality），激發情思的是觀者對這個空間的記憶和領悟」，¹²⁹ 通過這種追憶的視角，鸞嶼成為一種無可彌補的美好失落，那無何有之鄉，遂成為失去的樂園。所以1907年之後，關於八景的描述，經常都是這樣指稱鸞嶼的，「此中所謂鸞嶼者，乃基隆港內灣中心屹立者，風景絕佳，是八勝中的首位。現今因基隆港工程的關係，全部崩壞」，¹³⁰ 「鸞公鸞母二嶼，點綴于基隆灣。饒多風致，鸞嶼凝烟，八景之中推為翹楚。近因築港及市區改正工事，以火葯力為崩壞之，大有滄桑之感」，¹³¹ 在這裡，早已不在場的鸞嶼，卻躍居為八景的「首位」、「翹楚」，¹³² 在對往昔的追溯既往中，凝結為永恆的美好事物。

由上可知，八景中的「鸞嶼凝煙」雖然在物質層面上受到了毀滅破壞，但這種虛空反而讓它進入追憶的模式中，持續地被主體感知與組構，進而在基隆書寫中，形成永久留存的美好圖像。

128 豬口葆真，〈弔鸞嶼〉，「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8.04.03，1版。

129 巫鴻著，肖鐵譯，〈廢墟的內化：傳統中國文化中對「往昔」的視覺感受和審美〉，《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1），頁27。

130 讀古村莊主人，〈台灣八景〉，《臺灣日日新報》，1913.10.31，13版。

131 豬口葆真，〈弔鸞嶼〉作者自注，「詞林」，《臺灣日日新報》，1908.04.03，1版。

132 在1907年之前，從未有「鸞嶼凝煙」為首位的說法，至於基隆八景的排序則多以「雞山聚雨」為首篇。

（二）在場的仙洞與社寮島

當八景瓦解消失之後，能跨越不同時期，成為旅遊路線中固定景點的，似乎只有仙洞與社寮島。下列表格，可進一步印證此說：

表2 旅遊手冊與地方文獻對基隆八景的取擇

出處／景點	基隆を中心に (1924)	基隆市 (1929)	基隆市案内(1930)	基隆誌 (1931)	基隆史 (1934)
雞山聚雨					
獅嶺匝雲					
鯢頂瀑布					
鸞嶼凝煙					
仙洞聽濤	●仙洞辨財天	●仙洞	●仙人洞の聽潮	●仙洞窟	●仙洞
社寮曉日		●社寮島	●史蹟に富む社寮島	●社寮島	●社寮島
海門澄清					

由上表可知，日治時期的旅遊手冊與地方文獻，在介紹基隆的觀光景點時，於基隆八景取擇最多的就是仙洞與社寮島。此外，在景點解說方面，幾乎都會標示出其原屬八景之一，如「稱其名曰仙洞聽潮。算亦基隆有名八景之一景也」、¹³³「因其風景好處，故得選入基津新舊八景中，昔曰社寮曉日」，¹³⁴也就是說，列於八景之一，顯然更強化了其名勝地位。

作為觀光的展示窗，仙洞與社寮島一直是基隆書寫的重要主題，值得注意的是從「仙洞聽濤」到「仙洞」，所謂的「聽濤」因「築港關係，其水聲已不若從前之響唳」，¹³⁵且遊興空間未經規畫，「洞口張木屏，如商店狀，中有門，貼紅箋，書對聯，未能脫俗，惜無雅人以布置其幽景耳」，¹³⁶可以說這樣的場景，已離如畫風景甚遠，然而，鄭星五（?-1934）〈舜五弟同遊仙洞〉所見仍是：

133 簡萬火，《基隆誌》，頁24。

134 同註133，頁28。

135 同註133，頁29。由此可知，從基隆開始築港後，仙洞的濤聲就已經大不如前。中島新一郎，《基隆市案内》，頁76，亦記此事。

136 黃純青，〈雞籠紀遊〉，《臺灣日日新報》，1914.07.07，3版。

基津風景似西湖，小艇渡人入畫圖。仙洞欲尋舟子問，茲遊元禮喜同途。¹³⁷

在這裡，「似西湖」、「入畫圖」都是對如畫風景的一種讚美。其餘如伊藤賢道（生卒年不詳）¹³⁸的〈仙洞〉：「巖樹蒼蒼一逕深，仙人洞冷海光侵。凌波天女恍如見，潮去潮來送妙音」，¹³⁹湯苑春（生卒年不詳）的〈步星五兄仙洞即景原韻〉：「雲水烟霞裡，騷人儘日來。龍岩藏佛閣，虎穴作仙臺。洞口漁歌遠，江邊客艇遠。逍遙天地外，揮筆寫蓬萊」，¹⁴⁰古月山人（生卒年不詳）的〈遊基隆仙洞有感〉：「迢迢一水近山邊，到處風光亦惘然。別有人間何處是，彎彎曲曲探無天」，¹⁴¹也都是類似的造境。可以發現，不管仙洞的景觀如何變化，書寫者仍然保留著八景詩那種對理想山水的凝望。

如果說「仙洞」的「仙」可能限制了書寫者能見的視域，那麼從「社寮曉日」到「社寮島」，會不會更多著眼於其地獨特的人文景觀呢？¹⁴²然而，不論是黃純青〈舟過社寮〉的「滄波四面社寮村，雙槳迎潮入海門。夕照滿江帆一片，信濃吹笛鬪黃昏」，¹⁴³或是李本〈社寮島〉的「漁家隱隱水濱添，嵐影波光夏不炎。我愛山坡修別墅，半耕半讀歲時淹」，¹⁴⁴都可以說是一種恬淡閒適的理想山水。這似乎透露了八景詩所形塑的理想山水，對於其後的基隆書寫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除了上述在場與不在場者外，在基隆書寫中，八景還經常被視為基隆的代表性地景，如陳瘦雲的〈雞籠卽事呈瀛社諸君子〉：

昔年戰跡此重經，積雪都銷暑氣蒸。三面山環煙樹綠，一灣水漲海天

137 鄭星五，〈舜星五弟同遊仙洞〉，《臺灣日日新報》，1918.11.18，4版。

138 伊藤賢道曾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的漢文部主筆，《臺灣日日新報》，1910.04.01，第2版有所撰的〈就任之辭〉。

139 伊藤賢道，〈仙洞〉，《基隆港》（台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7.10），頁189。

140 湯苑春，〈步星五兄仙洞即景原韻〉，《臺灣日日新報》，1918.12.03，4版。

141 古月山人，〈遊基隆仙洞有感〉，《詩報》75期，1934.02.15，頁15。

142 社寮島獨特的人文景觀，參見註82。

143 黃純青，《臺灣日日新報》，1914.07.02，3版。

144 李本，〈基津雜詠三十首內之社寮島〉，「詩壇」，《臺灣日日新報》，1925.06.14，4版。

青。

雌雄鸞嶼終埋沒，大小獅球望渺冥。多謝詞人情意好，扁舟相與過前汀。¹⁴⁵

又如黃啟茂（生卒年不詳）的〈基隆港泛月〉：

牙檣錦纜泛中流，蕭瑟西風兩岸秋。雙槳破雲尋范蠡，一篙撐月憶瓜州。

獅球自古看長峙，鸞嶼而今悵不留。我愛扁舟仙洞外，棹歌夜靜傍江樓。¹⁴⁶

前者的「雞山」、「獅球」、「鸞嶼」，後者的「獅球」、「鸞嶼」、「仙洞」，都是以八景所在的地點作為基隆的地理指標，在這種意義脈絡中，八景不僅是認知基隆的地景符號，也幫助書寫者指認所在的位置。這似乎說明，基隆八景雖已瓦解消失，但其作為勝景的形象卻已深入人心。

六、結論

基隆八景是通過地點與物象的擇定，賦予空間一種可供觀賞的意境，這些被選擇的景點也因此成為極具美學價值的勝景。清代雖然出現了李逢時與《淡水廳志》兩組雞籠八景，但僅前者有詩傳世。換言之，雞籠八景詩在清代並未受到書寫者普遍的青睞。

八景詩的大量出現，要到日治時期。這與港都基隆在當時的躍進與改變關係密切，因為在殖民母國築港與市區改正計畫的雙重改造之下，基隆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與文明經驗的輸出地，成功地從漁村轉變為現代化的港口與城市。彼時的基隆不但是台灣首屈一指的繁華港都，而移植自東京的歐化經驗，更讓這個城市無論空間規畫還是指標建物，都充滿著現代／西洋風味，

145 陳瘦雲，〈雞籠卽事呈瀛社諸君子〉，「藝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06.29，1版。

146 黃啟茂，〈基隆港泛月〉，《詩報》25期，1931.12.01，頁15。

所以在島嶼新興的旅遊活動中，基隆成為重要的觀光場所。當觀光成為人們來到這個城市的重要活動，源自於古典命題的基隆八景往往被視為一種遊覽指南。與「觀艦」之類的活動不同，八景喚起的是觀景者對於「市隱」理想的一種憧憬，為了逃離城市的喧嚷繁忙，他們沿著指引，站在最佳的觀景點，安靜地凝視經過選擇的如畫風景，並領略其中的意境，透過這種觀看，基隆八景詩在二十世紀初開始引起書寫者的關注。

作為文學文本，基隆八景詩是書寫者透過心靈活動所創造的藝術品，如同 Ernst Cassirer（1874-1945）所說的，「藝術並不是對一個現成的即予的實在的單純複寫。它是導向對事物和人類生活得出客觀見解的途徑之一。它不是對實在的摹仿，而是對實在的發現」，¹⁴⁷ 所以基隆八景詩中的基隆並不同於客觀存在的那座城市，而是表現了事物被主體感知的形式，是一種再現。從這個角度出發，檢視基隆八景詩中的基隆，可以發現透過八景所設定的框定式觀看，其所要呈現的並非現實意義的某個景點，而是一種如畫風景的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被框定的如畫風景中，人為活動的元素將被排除或刻意降低其重要性，書寫者關注的是如何將詩中的景物美化，並且營造身臨畫中的感受。此外，書寫者在如畫風景的基礎上，還經常將基隆八景予以「理想化」，進一步形塑成迥異於現實塵世的仙境山水與寄託漁隱理想的隱居山水。在上述兩重的建構中，八景詩其實是替基隆的這八處名勝，進行一種文學性的「品題」，「有如宗教儀式中將空間淨化以轉化出神聖性的程序」，¹⁴⁸ 進而強化了八景自身的文化意義與美學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1907年基隆八景瓦解消失之後，其對之後的基隆書寫仍發生一定的影響。透過八景中不在場的鰲嶼以及在場的社寮島與仙洞，可知鰲嶼的不在場，不僅未讓意義消解，反而使其封存在過去、在回憶裡，成為一種無可彌補的美好失落。至於被規畫為旅遊路線固定景點的仙洞與社寮島，不但藉由八景強化其名勝地位，而八景所形塑的理想山水也始終存在於二者之中。此

147 Ernst Cassirer著，結構群編譯，《人論》（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公司，1991.12），頁223-224。

148 石守謙，〈導論——由文化意象談「東亞」之形塑〉，《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頁25。

外，八景在基隆書寫中，還經常被視為認知基隆的地景符號，幫助書寫者指認所在的位置。凡此種種，都可說明作為文化地景的基隆八景，其實已經成為基隆地方記憶的一部分。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中島新一郎，《基隆市案内》（基隆：基隆市役所，1930.12）。
- 加藤守道，《基隆市》（基隆：基隆市役所，1929）。
- 台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編，《基隆を中心に》（台北：末廣高等小學校，1924.07）。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地名辭書》（南投：省文獻會，1996.12）。
-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編，《台灣鐵道案内》（台北：台灣總督府鐵道部，1912）。
- 石守謙，《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2.02）。
- 石守謙、廖肇亨主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1.03）。
- 石坂莊作，《基隆港》（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7）。
- 作者不詳，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10）。
-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政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10）。
- 巫鴻著，肖鐵譯，《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1）。
- 巫鴻著，梅玫、肖鐵、施杰等譯，《時空中的美術：巫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集》（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0.06）。
- 李逢時，《泰階詩稿》（台北：龍文出版社，2001.06）。
- 李賀，《李賀詩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03）。
- 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詮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12）。
- 李嘉瑜編著，《日治時期台灣漢詩人：邱筱園詩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3.11）。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
- 祝穆，《新編方輿勝覽》（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3.06）。

- 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年鑑》（基隆：基隆市政府，1946）。
- 張炎憲編，陳存良譯，《基隆、淡水郡彙編》（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1.12）。
- 喜多隆二，《基隆史》（台北：基隆市教育會，1934）。
- 黃文德主編，《日治時期的基隆與宜蘭》（台北：國家圖書館，2012.01）。
- 黃紅炎編，《瀛海詩集》（台北：台灣詩人名鑑刊行會，1940.11）。
- 臨時台灣總督府工事部編，基隆港務局譯，《基隆築港誌》（基隆：基隆港務局，1975.06）。
-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08）。
- 蘇碩斌編，《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台灣的觀光文化》（台北：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07）。
- Ernst Cassirer著，結構群編譯，《人論》（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公司，1991.12）。
- James Cahill（高居翰）著，洪再新等譯，《詩之旅：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2.10）。
- John Dood（陶德）原著，陳政三譯，《北台封鎖記：茶商陶德筆下的清法戰爭》，（台北：原民文化，2002.07）。
- Paul Rabinow著，陳志梧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12）。
-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11）。
- 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03）。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申惠豐，〈地方與地方意象：以清領時期彰化八景詩為例〉，《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4號（2010.12），頁31-55。
- 吳毓琪、施懿琳，〈康熙年間「台灣八景詩」首創之作的空間感探討〉，《國文學報》5期（2006.12），頁35-55。
- 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台灣史蹟》39期

（2001.12），頁1-38。

林佩欣，〈日治時期基隆街（市）人口職業結構與地方參與〉，《史耘》12期（2007.06），頁71-86。

柯喬文，〈基隆漢詩的在地言說：《詩報》及其相關書寫〉，《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12期（2008.12），頁161-199。

陳青松，〈漫談基隆地區傳統文學發展史上〉，《台北文獻》160期（2007.06），頁69-122。

——，〈漫談基隆地區傳統文學發展史下〉，《台北文獻》161期（2007.09），頁59-94。

陳凱雯，〈從漁村到商港——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的形成〉，《兩岸發展史研究》創刊號（2006.08），頁257-299。

黃師樵，〈光復以前基隆開發小史〉，《台灣文獻》24卷1期（1973.03），頁84-99。

賴恆毅，〈在台日人之基隆書寫——以《基隆港》收錄之日人漢詩為觀察場域〉，《文史台灣學報》5期（2012.12），頁135-169。

（二）學位論文

林雅慧，〈「修」台灣「學」日本：日治時期台灣修學旅行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台灣史所碩士論文，2010）。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台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陳淑君，〈稼軒詞中鳥意象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羅曉萍，〈基隆港碼頭聚落的建構與形塑〉（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5）。

三、報紙文獻

《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詩報》